

# 抗衡或扈從： 14 個歐亞國家對俄國外交 政策選擇的再檢視\*

薛健吾\*\*

壹、前言

貳、14 個歐亞國家對俄國態度的變化

參、面對大國時小國外交政策的選擇

肆、研究設計與經驗資料分析

伍、結論與政策建議

冷戰結束以後，俄國與從其分裂出來的 14 個新興獨立國家之間的關係一直都是國際關係理論的一個絕佳實驗場。過去的

---

\* 本文的初稿曾經在 2015 年 11 月 15 日發表於在金門大學所舉行的台灣政治學會年會，作者感謝當時本文的評論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的李佳怡老師的寶貴建議，以及在場的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的張慶年仲老師、金門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的紀博棟老師和盧政鋒老師，以及成功大學政治學系的平思寧老師所給予的寶貴意見。作者也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所提出的精彩問題和對本文的肯定。關於歐亞國家與俄國的能源關係的部分，作者曾向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的魏百谷老師多次請教，亦特此致謝。當然，文中若有任何錯誤之處，皆為作者本人的責任。關於本文的資料和 STATA 工作流程，亦歡迎以電子郵件向作者聯絡索取。

\*\*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助理教授。E-mail: c.hsueh@nccu.edu.tw

投稿日期：2016 年 8 月 25 日；接受刊登日期：2016 年 12 月 29 日。

東吳政治學報/2016/第三十四卷第三期/頁 121-178。

研究發現，在這 14 個國家獨立之初，與西方關係愈接近、經濟能力愈好的國家，比較會對俄國採取抗衡的態度；反之，則比較會對俄國採取扈從的態度。然而，獨立之後至今已逾 20 年，這 14 國與俄國關係的發展如何？這兩個因素是否仍然是主導各國選擇抗衡或扈從俄國的主要因素呢？為了回答這兩個問題，本文發展出一個「抗衡或扈從」的測量，並據此發現，在冷戰結束之後，這 14 國與西方國家之間的關係對於選擇抗衡或是扈從俄國的重要性逐漸減低，而它們自己本身的經濟能力依然是決定其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本文認為，根據文獻的建議，國家經濟能力對於其外交政策選擇的重要性在於：第一，經濟能力愈好的國家，代表著該國的國家機器愈有解決各種國內問題的行政能力，也代表該國愈有足夠的資源可供動用來對抗潛在的對手，也就是愈具有抗衡的「能力」；第二，經濟能力愈好的國家，也因其有能力自主發展，其國內政治行為者對於是否堅持抗衡愈有著較高度的共識，也就是愈具有抗衡的「意願」。本文的論點得到了經驗證據的支持，對於兩岸關係的發展經驗與未來走向也具有深刻的理論意涵。

**關鍵詞：**抗衡；扈從；俄國；經濟能力；兩岸關係

## 壹、前言

在 1991~1992 年，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USSR) 解體分裂成為俄國以及 14 個新興獨立國家 (newly independent states, NISs)，<sup>1</sup> 也宣告了冷戰時代的結束。自從脫離俄國獨立之後，這 14 個歐亞國家都認知到，俄國對他們依然想要持續享有過去在蘇聯時期那樣的支配性的影響力 (李玉珍，1996)，當時俄國國會中的「國際事務與對外經濟關係委員會」(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Foreign Economic Relations) 的主席 Yevgeniy Ambartsumov 即曾公開宣示，俄國將對這些新興獨立國家採取一個類似美國對拉美國家的「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 的態度，聲稱俄國在這些國家享有獨特的權益，並且將排除其他國家插手這個地區的事務 (Dawisha & Parrott, 1994: 229)。在俄國強大的國力與影響力籠罩之下，這 14 個新興獨立國家在獨立之初有的選擇了抗衡俄國，有的選擇了扈從，也有選擇先抗衡而後扈從者 (吳玉山，1997a；1997b)。由於這 14 個國家來自於相同的歷史背景 (皆為前蘇聯的加盟國)，提供了一個比較政治分析的共同基礎，而且又各自具有不同的政治與經濟特徵，提供了一個找出外交政策差異的解釋基礎，因此探究這 14 個國家對俄國的外交政策選擇可以說是一個可供測試各種國際關係理論的絕佳社會實驗場。近年

---

1. 為了行文的方便，本文在之後將沿用過去文獻的分類，將這 14 個歐亞國家依地理位置由西北而東南分別分為「波羅地海三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西部三國」(摩多瓦、烏克蘭和白俄羅斯)、「高加索山三國」(喬治亞、亞塞拜然、亞美尼亞) 以及「中亞五國」(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烏茲別克、土庫曼)。

來，在強勢總統普丁的領導之下，俄羅斯重回世界大國舞台的決心愈來愈強烈，造成周邊國家與西方國家的壓力日益突顯，使得這個議題的重要性又重新浮上檯面。

在過去文獻的分析中，學者們對於這 14 個歐亞國家對俄外交政策的選擇有幾點結論。首先，Dawisha and Parrott (1994) 和 Drezner (1999) 發現，這 14 國在獨立之初，各有半數的國家選擇了抗衡或扈從俄國的立場：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摩多瓦、烏克蘭、喬治亞與亞塞拜然傾向於抗衡俄國，而白俄羅斯、亞美尼亞、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烏茲別克與土庫曼則是傾向於扈從俄國。接著，吳玉山 (1997a；1997b) 的研究與前述作者的研究有一些不同的觀點。吳玉山 (1997a；1997b) 發現，這 14 國在獨立後有堅持抗衡俄國者，如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立陶宛；有一開始即扈從俄國者，如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烏茲別克與土庫曼；亦有先選擇抗衡而後轉而扈從俄國者，如摩多瓦、烏克蘭、白俄羅斯、喬治亞、亞塞拜然與亞美尼亞。他所作出的歸納為，這 14 個國家中，與西方的關係愈接近、經濟能力愈好的國家，比較會對俄國採取抗衡的態度，而其他與西方的關係愈遙遠、經濟能力愈差的國家，比較會對俄國採取扈從的態度。吳玉山的解釋為，經濟能力好的國家之所以能夠成功維持其抗衡政策的原因，是因為這些較為接近西方、也較為富裕的國家，愈能夠得到西方世界的支持，因此西方世界的支持才是解釋各國之所以能選擇並且堅持「抗衡」政策背後的主要原因 (吳玉山，1997a: 8-12)。

然而，從目前 (2016) 的時間點來看，本文認為，過去的文獻有三個地方無法滿足我們對於理解這 14 個國家對俄國的外交政策選擇的好奇心。第一個地方在於，過去的研究並未直接對「抗衡」

與「扈從」這兩個重要的概念做出一個操作型定義 (operational definition) 上的測量，也因此在此實證研究上較不具有可否證性。Dawisha and Parrott (1994) 和 Drezner (1999) 的研究並未對各國抗衡或扈從俄國的程度做出測量，而是直接從各國「如何回應來自俄國的各種要求」來做出各國到底是抗衡俄國或是扈從俄國的判斷。然而，以這種方式做出判斷可能存在著「效度」(validity) 與「信度」(reliability) 的問題。俄國對於這 14 個國家曾經做出的要求甚多，諸如要求歸還核子武器、要求共同開採境內的礦物或能源、要求保障俄國僑民安全、要求在境內設置俄軍可進駐之軍事基地、要求共同管理經營重要的工業設施等等 (Drezner, 1999: 153-230)，在眾多來自於俄國的要求之中，這些國家並非所有的拒絕都表示其對俄國是採取抗衡的態度，也並非所有的讓步都表示其對俄國是採取扈從的立場，因為讓步的背後可能是與俄國在另外一些議題上面達成雙方滿意的交易，或是某些俄國的要求原本就不是這些國家特別注重的議題。吳玉山 (1997a; 1997b) 的研究則是以 1990~1991 蘇聯解體時各個國家有多麼想離開蘇聯來判斷這 14 國對俄國的態度，此外，吳玉山 (1997a; 1997b) 也在個案研究的部分，從各國獨立之後對俄國的各種互動情形的分析來支持其所認為的抗衡或扈從的判斷。然而，學者們以此類質化研究的方式所做出的判斷，仍有明顯的不一致之處，一個明顯的例子是，在本文第二節的表二中我們可以發現，Dawisha and Parrott (1994) 和 Drezner (1999) 的研究與吳玉山 (1997a; 1997b) 的研究，兩者對於西部國家 (摩多瓦、烏克蘭、白俄羅斯) 與高加索山國家 (喬治亞、亞塞拜然、亞美尼亞) 對俄國外交政策立場的判斷即有很大的出入。對各國抗衡或是扈從的外交政策選擇缺乏一個「穩定」而且兼具足夠「可否證性」的測

量，是過去文獻的第一個不足之處。

第二個地方就是關於過去的文獻所用來解釋各國外交政策選擇的說法是否至今仍然適用的問題，也就是說，「時間」的因素是否對這些國家的外交政策選擇造成改變呢？過去的文獻受限於觀察的時間不足，所以都是從一個「靜態」的角度以各國獨立之初數年的時間來分析。如Dawisha and Parrott (1994) 和 Drezner (1999) 分析的時間僅為各國獨立前後數年，而吳玉山 (1997a；1997b) 分析的時間為從各國獨立前後到 1996 年的時間。至今 (2016)，這些國家脫離蘇聯獨立已逾 20 年以上的時間，如果上述作者對這些國家的外交政策選擇所做出的解釋為真，則我們也應該要看到，當這些解釋原因隨著時間而改變的時候，這些國家的外交政策也應該要跟著改變，而其是否確實如此仍然是一個值得繼續追問的問題。

第三個地方在於，過去的文獻存在著一個研究方法上的問題值得我們持續去檢證。當研究者發現某些國家（姑且稱為 A 國家群）比另外一些國家（姑且稱為 B 國家群）更抗衡俄國的時候，那麼所有在 A 國家群中與在 B 國家群中有所不同的因素都有可能被研究者拿來當作解釋的變數，而在一個靜態的比較分析中，我們很難去驗證或否認這些說法。如果這些解釋外交政策選擇的因素為真，則我們也應該發現，這些因素的變化不僅僅是要在抗衡俄國的國家中與扈從俄國的國家中有所不同（計量經濟學上稱為 *between-country effect* 或 *space effect*），而且這些因素在每一個國家之內在各個不同年度中的變化（計量經濟學上稱為 *within-country effect* 或 *time effect*）也應該要影響到各國對俄國抗衡或扈從的選擇才對，這個推論是否屬實也需要進一步的探討。

從 1991 年蘇聯解體至今 2016 年，這 14 個歐亞國家脫離蘇聯

獨立已達 20 年之久。在這 20 年的演變之中，它們對俄國的外交政策選擇是否有所改變？其改變的原因又是否依然能夠被過去的理論所解釋呢？本文的目的，即在於發展出一個國家之間「抗衡或扈從」的有效測量，並根據這個新測量回答上述這兩個問題。這 14 個歐亞國家與俄國之間，存在著「權力不對稱」的關係，而在部分歐亞國家與俄國之間，甚至還存在著「主權的糾葛」(吳玉山，1997a；1997b)，因此，理解影響到這 14 國對俄政策轉變與否的因素，除了可幫助我們重新釐清各種國際關係理論的適用性之外，對於我們目前兩岸關係的理解亦存在著重要的啟示意義。

為了釐清影響這 14 個歐亞國家對俄國外交政策「是否改變」以及「為何改變」，本文的章節安排如下。首先這邊的第一節是前言的部分，介紹了本文的研究問題與其在國際關係理論與兩岸關係上的重要性。在第二節中，我將說明如何對這 14 國抗衡或扈從的外交政策選擇進行測量，並且以此重新檢視他們在這 20 年以來對俄國外交政策的變化。本節發現，這 20 年以來，這 14 個國家對俄國的態度皆有不同程度的轉變。接著在第三節中，我將討論文獻中對於國家選擇抗衡或扈從政策的解釋，並且根據文獻的建議提出本文的論點：第一，經濟能力愈高的國家，代表著該國的國家機器愈有解決各種國內問題的行政能力，也代表該國愈有足夠的資源可供動用來對抗潛在的對手，也就是愈具有抗衡的「能力」；第二，經濟能力愈高的國家，也因其有能力自主發展，其國內政治行為者對於是否堅持抗衡的選擇愈具有共識，也就是愈具有抗衡的「意願」，反之，經濟能力愈低的國家，其國內政治行為者將更可能出現選擇抗衡或是扈從的爭論，也因此較難以堅持抗衡的外交政策選擇。在第四節中，我將以最新的經驗資料來驗證「文獻所提供的各種可能的

說法」與「本文的論點」何者能夠更好地來解釋這 14 個國家對俄國外交政策的變化，並且透過追蹤資料 (panel data) 的統計模型來證明，各個國家的經濟能力確實比文獻中的各個因素更能解釋這 14 國對俄國抗衡或扈從的選擇。最後的第五節即為結論以及本文的發現對兩岸關係的政策建議。

## 貳、14 個歐亞國家對俄國態度的變化

本節首先討論如何對「抗衡」或「扈從」的外交政策選擇進行經驗上的測量，並以之與質化研究的文獻兩相對照，以檢證該測量的效度。接著，本節根據該測量的結果來分析這 14 個歐亞國家從獨立以後至今 20 年以來對俄國外交政策選擇的變化。

### 一、「抗衡」或「扈從」的測量

在相關的文獻中，學者們對於這 14 個歐亞國家對俄關係的研究都是以質化的方式來進行，由研究者分析各國對來自俄國的要求如何回應來作出抗衡或扈從的「判斷」，且這些判斷大多根據該國家的軍事部署、軍費支出、是否答應俄國在境內駐軍等等軍事上的要求來論斷，迄今在文獻中並未有研究者發展出可供「測量」的量化指標。<sup>2</sup> 本文認為，發展出可供測量的指標的困難之處與必須考

---

2. 這確實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因為在國際關係的文獻中討論到國家「抗衡或扈從」選擇的文獻可說是汗牛充棟，最常被引用的著作包括了Waltz (1979), Walt (1987), Christensen and Snyder (1990), Labs (1992), Schweller (1994), Christensen (1997), Mearsheimer (2001), Ross (2006) 等人的著作等等，但這些學者們對於國家到底是抗衡還是扈從幾乎都是以質化為主要的方法去「判斷」，目前為止，本文作者尚未在文獻中找到任何一種以量化的方式來「測量」抗衡或扈從的方法。

量之處至少有二。第一，沒有衝突的出現不一定代表扈從，有衝突的出現也並不一定代表抗衡。因為沒有衝突的出現也有可能是雙方在某些議題上的利益本就一致的結果，因此難以單從「缺乏衝突」這個事實來判斷是否扈從；亦或是，衝突的出現也有可能是雙方剛好只是在某個議題上面有一些無關大局的爭執，這類的爭執無論多麼嚴重都不會影響到雙方的實質關係，因此難以單從「出現衝突」這個事實來判斷是否抗衡。前面這一種情況有一個很好的例子，那就是在 2001 年的「911 事件」和 2004 年的「別斯蘭 (Beslan) 事件」這兩個重大恐怖攻擊行動之後，各國和俄國都對於反恐的合作有某種程度的共識，並也分別與俄國發展出程度不一的安全合作，但這並不代表原本抗衡俄國的國家在其他的議題上就改變了抗衡俄國的態度，只是「反恐」剛好是各國與俄國利益一致的議題罷了。後面這一種情況也有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美國和加拿大之間的漁業糾紛，從 1950 年以來，兩國之間為了漁業資源的爭奪，迄 2001 年已發生了 6 次之多的動用到武力的軍事化衝突 (Jones, Bremer, & Singer, 1996)，這個數字事實上跟中國與日本在同一段期間中所發生的軍事衝突的數目是相同的，然而，中日之間的抗衡是眾所皆知的，但大家並不認為美國和加拿大之間存在著抗衡的關係。其關鍵在於，兩國之間衝突的出現是否代表著抗衡，還必須要取決於兩國之間總體的利益到底有多不相容才能決定。因此，本文認為，一個測量抗衡或扈從的指標必須要能夠同時找出兩國之間「利益不相似的程度」與「衝突的程度」，才是一個有效度的測量。

第二，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一定都是「競爭」與「合作」同時並存，也就是說，兩國之間幾乎都是在某些議題中合作無間，而在另外一些議題中有著絕對不可以讓步的衝突，因此過去的文獻僅

單從某些特定議題、特別是軍事議題來做出各國對於俄國抗衡或扈從的判斷，不僅判斷略嫌主觀、議題考量不夠全面，也有信度不足的問題，這個問題可在前述不同的學者有著不同的判斷即可看出。譬如說，如果該國家屈服於俄國的壓力而接受了俄國的駐軍要求，則該國家往往將被研究者判斷為是扈從於俄國的，但卻忽略了該國家在其他非軍事的議題面向仍然是與俄國諸多抗衡的事實；或者是，如果該國家接受了俄國的優惠條件所以答應了與俄國在某個安全議題上的合作，則該國家往往將被研究者判斷為是扈從於俄國的，但卻忽略了這可能是一個令該國滿意的利益交易的結果，與該國的外交政策宏旨並無太大相關。因此，本文認為，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抗衡或扈從應該是一個整體集合式的 (aggregate) 現象，必須考量到兩國之間在各個不同議題上所有的互動的總體面向，才是一個有效度的測量。

為了滿足上述「並須考量到利益不相似的程度與衝突的程度」以及「必須考量到各種不同議題面向的全面性」這兩個要求，本文透過以下的方式來達成國家之間抗衡或扈從程度的測量。

#### (一) 建構指標一：從「聯合國大會的投票模式」測量「利益不相似的程度」

近年來，以計量分析為主的研究者發展出了許多測量國家與國家之間利益相似程度的指標 (Mesquita, 1975; Gartzke, 1998, 2000; Signorino & Ritter, 1999; Bennett & Rupert, 2003; Sweeney & Keshk, 2005)，而這些研究者們所使用的基本素材，即為由Bailey, Strezhnev, & Voeten (2015) 所編碼的世界各國在聯合國大會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United Nations) 的投票紀錄。以「世界各國在聯合國大會的投票紀錄」來作為國家與國家之間關係的測量其作法如下。首先，

聯合國的各個會員國家都有資格在最後得以進入大會表決的各個議案中投票表決，而各國對於每一次議案的投票都有三種選擇：投下贊成票、投下反對票，或是直接棄權放棄投票。接著，由於聯合國大會每年都有高達數十次到數百次不等的投票，因此兩國之間投票模式的相似程度就成為測量兩國關係的一個參考指標。當 A 國家與 B 國家在某一個議題中的投票模式相同時——也就是當 A 投贊成，B 也投贊成；或是 A 投反對，B 也投反對；或是 A 選擇棄權，B 也選擇棄權，這三種情形中的任何一種情形出現的時候——我們就可以認為這兩個國家在這個議題面向具有相似的利益。當然，如果只有一次的投票，那麼兩個國家出現相似的立場很可能純屬巧合，並不能代表什麼，然而，當投票表決的次數一多的時候，一個國家與各個國家之間在國家利益上的相似程度就會開始從「投票模式不同的百分比」之中浮現出來。在大多數的議題中投票選擇相似的國家，就表示在這些議題中他們的利益是較為相似的，反之，在大多數的議題中投票選擇相左的國家，就表示在這些議題中他們的利益是不同的。因此，在第一個面向「利益不相似的程度」上，本文採用歐亞各國與俄國在聯合國大會投票的不相似程度來作為兩國之間「利益不相似的程度」的測量。這個變數變化的範圍在理論上可以從 0%（兩國的投票模式完全相同，利益極為相似）到 100%（兩國的投票方式完全不同、利益極不相似）。

## （二）建構指標二：從「全球事件語言調性資料庫」全面測量「整體衝突的程度」

建構抗衡或扈從的測量所需要的第二個指標是兩國之間在各種議題上的「衝突的程度」。本文利用近年來國際關係研究中最著名的大數據（big data）資料庫——「全球事件語言調性資料庫」

(Global Database of Events, Language, and Tone, 簡稱 GDELT) 之中所記載的衝突資料來做測量。<sup>3</sup> GDELT 資料庫的建構方式是由電腦程式自動讀取自 1979 年 1 月 1 日 0 時 0 分以來的全球主要英文媒體的新聞報導 (也包括翻譯的外電), 對每一個被報導出來的事件中辨認出「發起國 (Source) 對目標國 (Target) 在什麼時間點採取了什麼樣的行為 (Action)」, 然後使用「衝突與調解事件觀察計劃」(Conflict and Mediation Event Observations, 簡稱 CAMEO) 的行為分類表對各種行為進行編碼,<sup>4</sup> 接著再使用 Goldstein 國際衝突合作量表 (conflict-cooperation scale) (Goldstein, 1992) 來決定各種行為在最衝突 (-10 分) 與最合作 (+10 分) 兩個極端值之間的分數。GDELT 的事件報導涵蓋了兩個國家之間所有的互動議題和事件, 也滿足了本文所強調的「必須考量到各個不同議題面向的全面性」的要求。根據前兩種編碼方式的結果, GDELT 資料庫本身提供了一個將國家之間的每一次互動從最合作到最衝突分成四類的變數 (QUADCLASS), 分別為「物質上的合作」、「言語上的合作」、「言語上的衝突」或「物質上的衝突」。本文計算各國與俄國之間「言語上的衝突」或「物質上的衝突」佔兩國所有互動紀錄上的比率, 來作為兩國之間在全部議題面向上的「整體衝突程度」的測量。<sup>5</sup> 這個變數變化的範圍在理論上可以從 0% (兩國在所有的互動記錄

---

3. The GDELT Project 資料庫的網址為：<http://gdeltproject.org/>。檢索日期：2015/11/01。有關本資料庫進一步的介紹，可見 Leetaru and Schrodt (2013)。

4. 有關 CAMEO 的詳細編碼方式，可見該計劃的官方網站：<http://eventdata.parusanalytics.com/data.dir/cameo.html>。檢索日期：2015/11/01。

5. 因為下列三個原因，所以本文選擇以衝突佔所有互動的「百分比」來測量，而非直接計算兩國衝突的「次數」。第一，衝突次數多並不直接代表兩國之間的關係不好，也有可能是因為兩國之間互動的次數非常多的結果，也就是說，衝突的次數雖多，但也可能合作的次數其實更多，如此一來若直接計算衝突的次數恐有誤導之嫌，因此以衝

中完全沒有衝突只有合作) 到 100% (兩國所有的互動記錄中全部都是衝突而沒有合作)。

### (三) 建構本文的依變數：國家之間「抗衡或扈從」的測量

根據這兩個指標的訊息，我們可以建構兩國之間抗衡或扈從的測量。表一將這兩個指標分別取高低之別而指明了四種可能的情況：當各國與俄國的利益較為相似的時候，衝突發生的比率自然較低，此時就沒有抗衡或扈從的問題，因為兩國的利益本就能夠達成自然和諧，此與Keohane (1984: 53) 所說的「因為各國所追求的利益相同所以不需要刻意去合作就能達成和諧 (harmony)」的概念相同；而當各國與俄國的利益不相似程度開始增加的時候，各國就必須在「抗衡」或「扈從」之間做出抉擇，此時如果在各個議題的互動上雙方的衝突比率增加，則表示該國對俄國是採與一個較為抗衡的立場，反之，在利益不相似的情況之下，如果在各個議題的互動上雙方的衝突比率減少，則表示該國對俄國是採與一個較為扈從的立場。因此，抗衡或扈從的測量即為上述這兩個指標相乘起來的「乘積」：

$$\text{各國抗衡俄國的程度} = \text{該國與俄國的利益不相似的程度} \times \text{該國與俄國的衝突程度}$$

---

突次數佔所有互動次數的百分比來測量較能夠控制兩國之間互動次數多寡的干擾；第二個原因則是大數據資料庫本身的問題，那就是隨著資訊科技的進步，被報導出來的新聞事件總次數其實是逐年增加，因此若直接計算衝突的次數將會得到每年發生的衝突愈來愈多的結果，以百分比來表示可以控制這個問題；第三，以百分比為單位也較容易跟同樣也是以百分比為單位的第一個指標「兩國利益不相似的程度」來做運算。

表一 本文對於抗衡或扈從的測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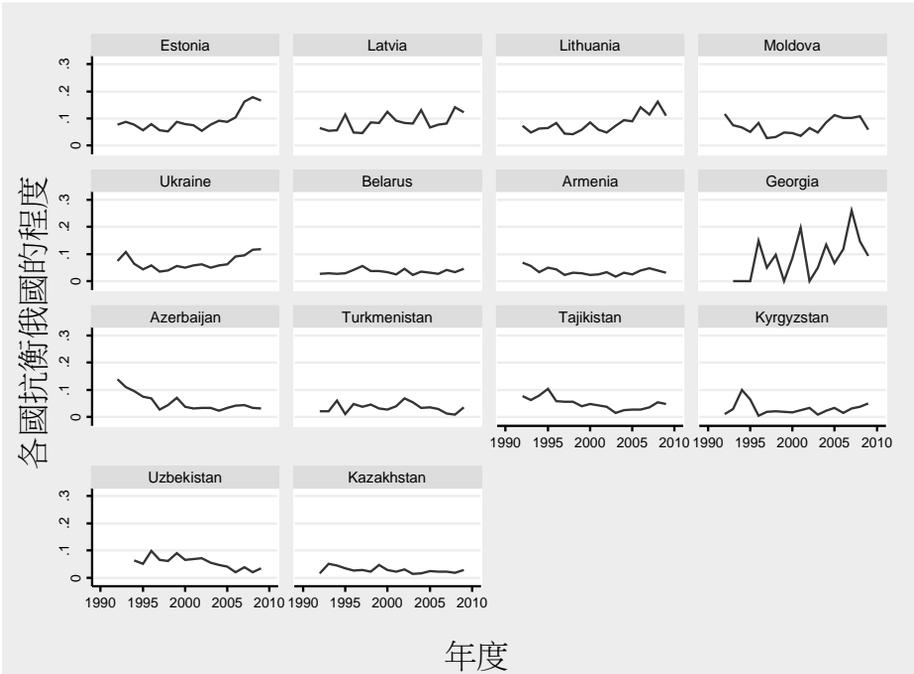
		該國與俄國的衝突程度	
		低	高
該國與俄國的利益不相似的程度	低	雙方缺少衝突的議題，自然達成和諧	理論上不會發生
	高	偏向扈從	偏向抗衡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在這個測量之下，若該國與俄國的「利益不相似的程度」愈高，且該國與俄國的「衝突的比率」愈高，則該國的這兩個指標相乘起來的「乘積」將會愈大，表示該國對俄國抗衡的程度愈高。據此，「這兩個指標的乘積」就是本文所建構出的國家之間「抗衡或扈從」的測量。

## 二、分析 14 國 20 年以來對俄國外交政策的變化

根據上述的測量方式，下面的圖一表示了這 14 個歐亞國家在這 20 年以來對俄國外交政策態度的變化。圖中的橫軸表示「年度」，縱軸為「各國抗衡俄國的程度」，數值愈高，即代表在該年該國對俄國採取愈為抗衡的立場。



資料來源：作者以 STATA 統計軟體自繪。

圖一 歐亞 14 國抗衡俄國的程度變化，1992~2009

接著，本文將圖一的結果與一些質化研究所得到的結論做一個簡單的對照，如果這個以計量的方式所測量出來的結果跟質化研究者所下的判斷相符，則我們對於這個量化測量的效度將更具有信心。這邊試舉數例如下：例如，Dawisha and Parrott (1994)、Drezner (1999) 和吳玉山 (1997a) 都認為波羅地海三國對俄國是採取抗衡的態度，而中亞五國對俄國是採取扈從的態度，若將其對照圖一中各國對俄國的抗衡程度，則我們可以看出，在上述文獻所研究的這段期間，波羅地海三國對俄國的抗衡程度確實較高，而中亞五國對俄國的抗衡程度確實較低。例二，Dawisha and Parrott (1994)、Drezner (1999) 和吳玉山 (1997a；1997b) 對西部國家與高加索山國家對俄

國立場的判斷稍有出入，若將其對照圖一，則我們可以看出這些國家在 1995~2000 年之間抗衡俄國的程度尚未呈現出一個明朗的走勢，不易判讀這些國家對俄國的態度變化，此與這些質化研究者無法取得共識的判斷也相似。例三，龍舒甲 (2001) 認為，俄國從 90 年代後期起開始積極修復其與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之間的關係，但其效果仍屬有限，若將其對照圖一，則我們可以看出 90 年代後期這兩國抗衡俄國的態度確實僅僅只有微幅降低。再例如，楊三億 (2009) 對西部三國的研究指出，由於三國內部各自的不同因素，使得烏克蘭和摩多瓦在近年來對俄國的態度屢有起伏波動，而白俄羅斯則一直保持著親俄的立場，若將其對照圖一，則我們可以看出，烏克蘭和摩多瓦在近年來抗衡俄國的程度確實出現過鋸齒狀的起伏，而白俄羅斯抗衡俄國的程度確實也維持著穩定的低比率。從這四個例子可見，本文所發展出的對抗衡或扈從的測量，與質化研究者的分析所做出的判斷是大體相符的，可以說是具有一定的效度。

圖一的分析結果也突顯出了過去文獻中的一些未盡之處，值得我們重新來檢視。第一，隨著時間的演變，選擇抗衡俄國與選擇扈從俄國的那些國家與過去研究的發現已有些許不同。雖然波羅地海三國仍然維持他們抗衡俄國的立場，但他們對俄國抗衡的程度卻是隨著時間逐漸微幅上升；原本對俄國即採取扈從態度的中亞五國，其立場在這 20 年以來基本上維持穩定；而在原本對俄國的態度甚為糾結的西部國家和高加索山國家中，烏克蘭和喬治亞抗衡俄國的態勢愈來愈明朗，白俄羅斯、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對俄國的關係則幾無變化，摩多瓦則是出現數度糾結的情形。第二，也因為選擇抗衡俄國與選擇扈從俄國的那些國家與過去研究的發現已經有部分不同，則過去文獻中所發現的解釋這些國家外交政策選擇的原因是否

依然適用？或已隨著時間過去而有所改變？這兩個文獻中的未盡之處即為本研究所想要解答的問題。

如果許多的國家對俄國的外交政策已有所轉變，那要如何解釋是什麼因素造成這些國家對俄關係的變化呢？表二為這 14 個國家在這 20 年以來在幾個重要方面的基本發展情形。從表二之中，我們可以得知以下的概況。首先，無論是從地理面積、人口、總體國內生產毛額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sup>6</sup> 或是軍費支出來看，俄國對於這 14 個歐亞國家具有極度不對等的權力絕對優勢。第二，過去幾個在文獻中被認為是影響到這 14 國選擇抗衡或扈從的重要因素，如各國與俄國在政治體制上的差異、各國與俄國的經濟能力、各國在貿易上被俄國依賴與依賴俄國的程度，以及各國的能源依賴他國進口的程度等等，在這 20 年以來皆有不同幅度的變動。在這些重要的政治經濟因素皆有變動的情況之下，是哪一個或是哪一些因素能夠持續影響到各國對俄國的外交政策選擇呢？在下面的第三節中，本文將討論文獻中的解釋，並且提出本文的看法。

---

6 即本表中「經濟能力 (GDP per capita)」與「人口數」兩者的乘積。

表二 14 個歐亞國家的重要特質與他們對俄國外交政策的選擇，1992~2009

國家所處區域	國家	Dawisha and Parrott (1994) 和 Drezner (1999)	吳玉山 (1992→1997)	面積 (平方公里) <sup>1</sup>	人口數 (萬人) (2015) <sup>2</sup>	民主程度與自由程度 (1992→2009) <sup>3</sup>	發展程度 (Real GDP per capita) (1992→2011) <sup>4</sup>	與俄國的貿易佔 GDP 的比重 (1992→2009) <sup>5</sup>	能源進口佔所需能源的比重 (1992→2011) <sup>6</sup>
	俄國 Russia			17,098,242	14,242.4	5→4(無政體) 6→11(不自由)	16,819 →18,678		-43.1% →-79.9%
波羅地海國家 The Baltic Sea	愛沙尼亞 Estonia	抗衡	抗衡	45,228	126.5	6→9(民主政體) 6→2(自由)	8,635 →20,102	1.6%(1993) →5.1%	32.2% →11.6%
	拉脫維亞 Latvia	抗衡	抗衡	64,589	198.7	8→8(民主政體) 6→3(自由)	8,360 →16,006	1.1% →4.5%	82.3% →52.5%
	立陶宛 Lithuania	抗衡	抗衡	65,300	288.4	10→10(民主政體) 5→2(自由)	8,858 →17,200	1.5%(1993) →12.5%	60.3% →79.0%

1. 資料來源為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2015)。

2. 資料來源為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2015)。

3. 民主程度的資料來源為 Marshall, Gurr &amp; Jaggers (2013)。-6 分及以下為「威權政體」，-5 分到 5 分為「無政體」，6 分及以上為「民主政體」；自由程度的資料來源為 Freedom House：https://freedomhouse.org/，11 分到 14 分為「不自由」，6 分到 10 分為「部分自由」，5 分及以下為「自由」。

4. 資料來源為 Feenstra, Inklaar &amp; Timmer (2013)。

5. 資料來源為 Barbieri &amp; Keshk (2012)。

6. 資料來源為 World Bank (2013)。若數值為負值即表示該國為能源的出口國。

西部國家 The West	摩多瓦 Moldova	抗衡	從抗衡到扞從	33,851	354.7	5→8(民主政體) 10→8(部分自由)	4,501 →3,393	3.9% →6.9%	98.8% →96.3%
	烏克蘭 Ukraine	抗衡	從抗衡到扞從	603,550	4,442.9	6→6(民主政體) 6→5(自由)	7,974 →8,176	4.0%(1994) →7.0%	49.1% →32.4%
高加索山國家 The Caucasus Mountains	白俄羅斯 Belarus	扞從	從抗衡到扞從	207,600	959.0	7→7(威權政體) 7→13(部分自由)	9,826 →15,353	1.9% →13.9%	90.5% →85.4%
	喬治亞 Georgia	抗衡	從抗衡到扞從	69,700	493.1	4→6(民主政體) 9→8(部分自由)	3,727 →5,839	0.1% →1.5%	83.1% →68.5%
	亞塞拜然 Azerbaijan	抗衡	從抗衡到扞從	86,600	978.1	1→7(威權政體) 10→11(部分自由)	5,377 →9,317	1.0% →1.9%	2.8% →-377.3%
	亞美尼亞 Armenia	扞從	從抗衡到扞從	29,743	305.6	7→5(無政體) 7→10(部分自由)	2,872 →5,235	1.0%(1993) →6.0%	93.3% →67.3%
	哈薩克 Kazakhstan	扞從	扞從	2,724,900	1,815.7	-3→-6(威權政體) 10→11(不自由)	10,439 →16,270	3.5%(1994) →6.9%	-13.5% →-105.1%
中亞國家 The Middle Asia	吉爾吉斯 Kyrgyzstan	扞從	扞從	199,951	566.5	-3→7(民主政體) 6→9(部分自由)	5,161 →2,217	0.8% →11.8%	63.5% →47.7%
	塔吉克 Tajikistan	扞從	扞從	144,100	819.2	-6→-3(威權政體) 12→11(不自由)	2,825 →2,437	0.1%(1993) →6.4%	60.0% →35.6%
	烏茲別克 Uzbekistan	扞從	扞從	447,400	2,920.0	-9→-9(威權政體) 12→14(不自由)	3,199 →6,209	2.8%(1994) →1.9%	10.0% →-19.9%
	土庫曼 Turkmenistan	扞從	扞從	488,100	523.1	-9→-9(威權政體) 13→14(不自由)	7,037 →12,531	0.1%(1994) →2.1%	-370.2% →-164.0%

附註：

1. 以陰影標示之處為各個學者們對於這些國家的對俄態度所下判斷的不同之處。
2. 所有的 14 個歐亞國家在獨立之前或之後都與俄國簽有共同防衛協定 (defense agreement) 或是互不侵犯協定 (nonaggression agreement) (Gibler, 2008)，因此本表就不顯示這些國家是否與俄國有同盟關係，基於相同的理由，在下一節的統計分析中，本文也不把「兩國是否為盟國」放進模型中作為控制變數。

## 參、面對大國時小國外交政策的選擇

### 一、「小國」對「大國」的外交政策選擇之謎

在過去文獻的分析中，我們至少有四種不同的模型來解釋「大國」對「大國」的外交政策選擇 (Rose, 1998)，這四種不同的模型由強調「系統」(system) 的影響力到強調「單元」(unit) 的影響力由高至低分別為攻勢現實主義 (offensive realism)、新古典現實主義 (neoclassical realism)、守勢現實主義 (defensive realism) 與國內政治主義 (*innenpolitik theories*)。簡單來說，攻勢現實主義認為在無政府狀態下國家為了安全和生存只要一有機會就會採取進攻的態度，而在面對威脅時則傾向於推卸責任 (Mearsheimer, 1994: 2001)；新古典現實主義認為國家會採取進攻或是防守的態度必須取決於決策者對於無政府狀態和相對權力的解讀來決定如何行動最為安全 (Jervis, 1976; Wohlforth, 1987; Christensen, 1996; 1997; Zakaria, 1998)；守勢現實主義認為國家基本上只是想要維持現狀，並且會組成聯盟來制衡新崛起的權力或是威脅 (Jervis, 1978; Van Evera, 1984; 1985; Walt, 1987; Glaser, 1994; Lynn-Jones, 1995; Taliaferro, 2001)；而國內政治主義則是認為一國的外交政策選擇必須要從該國國內政治的特質來找答案 (Snyder, 1991; Bueno de Mesquita, Smith, Siverson, & Morrow, 2003; Narizny, 2007; Weeks, 2008; 2012; Bueno de Mesquita & Smith, 2012)。總體而言，「大國」在面對「大國」所帶來的威脅時的外交政策大概有攻勢、守勢、結盟制衡和卸責等等幾種主要選擇，而決定大國外交政策選擇的因

素，不外乎是大國之間彼此相對實力的變化、大國內部對於外在威脅的感知與國內動員的難易，以及各國的政體類型、國內利益團體的性質與該國的主流意識形態等等。

然而，這四種不同的外交政策選擇模型基本上是在解釋「大國」的外交政策，而對「小國」在面對「大國」時的外交政策選擇的研究較少提及。小國外交政策選擇有別於大國的不同點在於，第一，小國的國力和影響力皆屬有限，因此可供選擇的外交政策操作範圍自然也遠不如大國寬廣 (Liska, 1962: 27; Rothstein, 1968: 29; 59-62)；第二，小國因其為小國，其所處的環境通常也會處在一個由區域大國 (regional hegemony) 或是全球大國 (global hegemony) 所治理或是共同治理的等級制度 (hierarchical structure) 之下 (Thompson, 1973; Lake & Morgan, 1997; Lemke, 2002; Buzan & Wæver, 2004; Katzenstein, 2005; Lake, 2009)，也因而使其外交政策選擇的空間更為受限；第三，引用吳玉山 (2009) 的說法，「由於大國是採取高姿態來壓迫小國，所以小國基本上要在抗拒和屈服之間做一個抉擇，而不可能和大國之間發展出真正平等的關係」(吳玉山, 2009: 40)。根據 Ross (2006) 和 Kang (2007) 在研究東南亞各國在面對中國崛起時的策略反應所得到的建議，他們認為，小國在面對大國時可能採取的外交政策變化範圍為一道從「抗衡」到「扈從」的連續光譜，從「最不擔憂大國的威脅」到「最擔憂大國的威脅」可大致分為扈從 (bandwagon)、接納 (accommodate)、避險 (hedge) 與抗衡 (balance) 這四種外交政策的選擇：小國選擇「扈從」是為了獲取可從大國得到的利益或中立化大國所帶來的威脅，因此而採取配合大國的作為；選擇「接納」是因為擔憂大國將會威脅到自身的安全，但又缺乏直接抗衡大國的能力，因此雖然並不配合大國的要

求，但也難以在行動上真的去採取什麼對抗大國的作為；<sup>7</sup> 選擇「避險」的作為是因為擔憂大國可能帶來的安全威脅，因此採取對大國與對其他的大國同時保持合作關係的外交政策；而選擇「抗衡」則是對大國在未來使用武力威脅的可能性做好軍事上的準備，並且與其他的大國組成一個與之對抗的聯盟 (Kang, 2007: 53)。

根據亞洲中小型國家 (secondary power) 回應中國崛起的外交政策反應，學者們整理出了幾種解釋小國在面對大國時如何在這個「扈從—抗衡」的光譜中選擇外交政策的說法。Ross (2006) 認為，使用傳統現實主義和新現實主義的「權力」面向即可充分解釋亞洲國家如何回應中國的崛起，而亞洲國家對中國在經濟上的依賴程度並不是重要的因素。在朝鮮半島、日本和台灣，雖然中國在經濟上的影響力日益比美國重要，但由於這些國家直接面臨中國的軍事威脅，所以對中國的崛起採取「接納」的外交政策；而在東南亞，雖然中國在經濟上的影響力日益比美國重要，但因為中國在此處的影響力僅限於經濟上，而在軍事上的影響力仍然大幅落後於美國，因此東南亞國家選擇在軍事上持續鞏固過去與美國的聯盟關係，對中國的崛起採取一個柔性的「抗衡」外交政策。Kang (2003; 2007; 2010) 認為，基於朝貢體系 (tribute system) 的歷史交往經驗，中國對東亞小國來說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區域霸權，呈現「統而不治」的階層式秩序，也因此東亞國家大多能夠接受中國而採取一個「接納」的外交政策。鄭敦仁和徐斯勤 (2007) 認為，亞洲國家並未對中國採取明顯的「制衡」或「扈從」，而是選擇在中國和美國之間採用「靈活性接觸」(flexible engagement) 的優化式避險策略，這是因為中國

---

7. 更多有關「接納」(accommodate)這個外交政策選擇的討論，可見Schweller (1994)、Schroeder (1994) 以及Levy (2002: 139-140)。

並未在權力的各個面向上明顯優於亞洲國家或美國，<sup>8</sup> 因此亞洲各國對於中國的崛起多採取「接納」而非「抗衡」，因為對這些國家來說，中國崛起所帶來的市場機會遠大於威脅，關鍵還是放眼於未來的經濟機會。Chung (2009) 研究亞洲各國 2004~2007 年對中國的政策回應發現，與美國有同盟關係的國家、與中國有領土糾紛的國家，以及民主的國家，大多傾向於對中國採取更為抗衡的態度；反之，與美國沒有同盟關係的國家、與中國沒有領土糾紛的國家，以及威權的國家，則傾向於對中國採取更為扈從的立場。Chen and Yang (2013) 則是使用分類法 (typology) 的方式，發現「認為中國將帶來高度安全威脅且會對本國經濟帶來負面影響的國家」將會對中國採取抗衡的外交政策，「認為中國不會帶來安全威脅且會對本國經濟帶來正面影響的國家」將會對中國採取扈從的外交政策，而那些「認為中國帶來高度安全威脅但可為本國經濟帶來正面影響的國家」以及那些「認為中國不會帶來安全威脅但卻為本國經濟帶來負面影響的國家」則會對中國採取避險的外交政策。

那麼，過去學者們對於作為小國的東亞國家對於作為大國的中國的外交政策選擇所作出的解釋，是否能夠幫助我們理解作為小國的這 14 個歐亞國家對俄國外交政策的選擇呢？本文認為，上述這些解釋都無法解釋這 14 個歐亞國家的對俄關係，其理由如下。首先，如本文前面所述，各個學者對於「扈從」、「接納」、「避險」、「抗衡」等等外交政策選擇並未提供一個具體且一致的定義，更從未發展出一個在計量上能夠被操作化測量出來的指標，使得我們在

---

8. 例如，雖然中國在人口數量、市場規模、工業產值與軍隊人數等等物質權上明顯優於亞洲各國，但是在創新能力、文化產業、武器設備或實際作戰能力等等非物質的權上，中國並未取得明顯的優勢 (Beckley, 2011)，也因此使得中國並未在各方面都能夠確實讓各國感受到實質的威脅。

評估這些學者們的說法時面臨經驗證據檢證上的困難。第二，對於這 14 個歐亞國家來說，一來與俄國之間的貿易關係並非其經濟命脈，二來俄國也不具有中國那般廣大的內需市場，因此俄國與這些歐亞國家的關係，並不像是中國對亞洲國家那樣可以帶來廣大的市場與機會而足以靠經濟誘因而吸引扈從；第三，俄國與這些歐亞國家之間缺乏像是中國與亞洲國家那樣的朝貢體系背景，而且俄國對各個國家經常使用侵略或經濟制裁來達到其要求 (Drezner, 1999)，<sup>9</sup> 不像中國與亞洲國家之間維持一個相對和平的關係，因此解釋亞洲國家對中國採取「接納」態度的背景在俄國與這些歐亞國家之間並不存在。第四，所有的歐亞國家與俄國之間皆有同盟關係，而且與俄國沒有領土糾紛的國家、以及與俄國政體相近的國家，也未必採取較為扈從俄國的態度，顯然這三個解釋東亞國家對中國反應的因素並非影響到各國與俄國關係的主因。第五，更重要的問題是，上述所有文獻的分類法皆屬於「靜態」的分析，只能解釋為何某些國家較另外一些國家對俄國採取更抗衡或是更扈從的立場，無法解釋「在同一個國家中的不同年度」對於俄國選擇抗衡或扈從程度的波動。如果文獻中的論點為真，則我們也應該要發現當文獻中所列出的理由在同一個國家的不同年度中出現變化的時候，該國對俄國的外交政策選擇也應該要受到影響才是，這個「時間動態」的驗證更是過去以質化為主的文獻中所欠缺的部份。

如果上述這些研究小國對大國外交政策的文獻都無法解釋這 14 個歐亞國家對俄國的外交政策選擇，那麼到底是什麼因素在背後

---

9. 根據戰爭數據資料庫 (Correlates of War Database, COW) 中的「軍事化國際衝突」(militarized interstate dispute) 的資料，在 1992~2009 這 18 年間，俄國與除了白俄羅斯之外的其他 13 個歐亞國家都曾經有過軍事衝突。

影響到這些國家選擇對俄國採取了不同的抗衡程度呢？

## 二、本文的論點

根據過去文獻的建議，本文認為，小國面對大國的時候，在一個權力不對等的情況之下，小國擁有多少的「能力」(ability) 與「意願」(willingness) 來抗拒大國的影響力，將影響他們對大國的外交政策，而小國具有多少的「能力」與「意願」來維持其抗衡大國的外交政策選擇，則取決於他們本身是否能夠有足夠的經濟能力來支持「抗衡大國」這個艱難的決定。

本文的論點是立基於兩個既有的理論的基礎上所建立起來的，其一為Schweller (2004; 2006) 在解釋為何在大多數的時間大多數的國家面對威脅時都呈現抗衡不足 (under-balancing) 的狀態的研究，其二為Morgan and Palmer (2000) 以及 Palmer and Morgan (2006) 在解釋為何國家在不同的資源稟賦之下會採取不同的外交政策的原因的研究。

Schweller 在其對歷史的分析中發現，即使是在面對一個明顯威脅的情況之下，國家要採取「抗衡」的外交政策選擇絕非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必須有許許多多的條件要能夠符合，國家才有辦法堅持一個「抗衡」的外交政策選擇。而其中，他認為最重要的幾個條件是「該國內部的政治菁英是否對於採取抗衡的立場具有共識與凝聚力」——因為這直接影響到了決策者是否有制衡的「意願」，以及「該國政權的脆弱性必須夠低並且具有足夠的社會凝聚力」——因為這直接影響到了國家機器是否有攫取社會資源以實現制衡目標的「能力」。唯有在「意願」與「能力」兼備的情況之下，國家才有辦法堅持抗衡的外交政策選擇。正因為要堅持一個抗衡的立場是

這麼地不容易，因此成功抗衡大國對決策者來說是一項偉大的政治成就，如果沒有一定的努力與堅持，成功的抗衡並不會自然發生 (Schweller, 2004；2006)，這也就是為什麼在歷史上大多數的時候我們常見到國家推諉責任、而少見到國家結盟抗衡的原因 (Kaufman, Little and Wohlforth, 2007)。

從 Schweller 的經驗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到，即便是身為「大國」，在面對是否要去抗衡一個威脅的時候，要做出選擇「抗衡」的外交政策的決定仍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那是因為抗衡大國是需要付出巨大代價的，而選擇抗衡的立場幾乎無任何「新的」利益可圖，因為選擇「抗衡」只是在尋求維持一個已經擁有的東西，而選擇「扈從」時可能還會從大國那邊得到一些好處，特別是那些鼓吹對大國扈從的政治菁英 (Schweller, 2006: 3-4)。大國猶如此，那麼對於可動用資源與大國有相當差距的「小國」來說，在沒有第三方的幫助之下，堅持與大國的對抗更是代價高昂。對小國的決策者來說，維持一定的軍備以對抗大國需要資源，抗拒大國的文攻武嚇需要資源，面對大國的經濟制裁與拒絕大國的收買利誘也需要極大的機會成本，若堅持對大國採取對抗的立場，將會耗費相當多原本可以用來做其他發展用途的寶貴資源，因此，是否擁有足夠的資源可供動用是其是否能夠堅持抗衡的關鍵。再者，對小國的決策者來說，耗費原本可以用來安頓其他國內事務或鞏固支持基礎的資源來與大國對抗，則將在國內引發爭議 (Starr, 1994)，這個情形不論是在遴選集團 (selectorate) 較大的民主國家或是遴選集團較小的非民主國家皆然 (Bueno de Mesquita et al., 2003; McDonald, 2007)。

除了 Schweller 的理論建議之外，Morgan and Palmer (2000) 以及 Palmer and Morgan (2006) 對於國家可動用資源的多寡與外交政

策選擇的研究，也在理論上更加確立了「經濟能力」與「抗衡程度」之間的因果關係。Morgan 和 Palmer 兩人的理論認為，每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都在同時追求兩種不同的政策目標（或稱為政策財貨）：維持現狀財（maintenance）與改變現狀財（change）。前者意指國家努力維持已有的狀態，不讓外面的情況朝更壞的方向發展；後者意指國家除了維持已有的狀態之外，還努力使外面的情況往更想要追求的方向發展。對每一個國家來說，最理想的情況當然就是擁有愈多的資源來把現狀改變成為自己想要的方向，然而，每一個國家的可動用資源都是有限的，因此必須盡可能地把有限的資源做最有效率的配置。當國家的可動用資源愈有限的時候，要達成「改變現狀」的政策目標愈為不易，則在資源運用效率的考量之下，寶貴的資源將被更多地投入到追求「維持現狀」的各種外交政策選擇；反之，當國家的可動用資源愈豐富的時候，要達成「維持現狀」的政策目標愈為容易，則在資源運用效率的考量之下，寶貴的資源將被更多地投入到追求「改變現狀」的各種外交政策選擇。在這個邏輯之下，國家的經濟能力若愈好，代表其可動用的資源愈多，則其外交政策作為除了「維持現狀」之外，也更加可能在「改變現狀」的方向上出現更多更積極的作為。Clark, Nordstrom, and Reed (2008) 的相關經驗研究也發現，可動用資源不足的國家通常僅追求低成本的外交政策作為，較少與其他國家發生衝突，而可動用資源愈多的國家捲入國際合作與國際衝突也愈多，這個發現也進一步支持 Morgan 和 Palmer 兩人的理論。

總和來說，根據文獻與理論的建議，經濟能力愈好的歐亞國家，愈有足夠的可動用資源與內部凝聚力來支持抗衡俄國的外交政策作為，因此，如果本文的說法為真，則本文必須在經驗證據上能

夠得到驗證的假設為：

**假設：在其他條件不變之下，這 14 個歐亞國家的經濟能力愈好，則其將對俄國採取愈為抗衡的態度。**

在下一節的經驗資料分析中，本文將證明，許多在文獻中所認為的影響小國對大國外交政策選擇的重要變數，在解釋歐亞 14 國對俄國的關係上都無法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性，而這 14 個歐亞國家各自的經濟能力才是決定他們對俄國選擇抗衡或是扈從的關鍵。

## 肆、研究設計與經驗資料分析

### 一、統計模型的選擇

本文主要探討這 14 個歐亞國家對於俄國所採取的外交政策如何在抗衡與扈從之間演變。本文在第二節中建構了抗衡或扈從的測量，即為兩國之間「利益不相似程度」以及「衝突程度」的乘積，是屬於一個連續的 (continuous) 依變數，數值愈高表示該國在該年採取對俄國更加抗衡的立場，反之，數值愈低則表示該國在該年採取對俄國更加扈從的立場。

本文資料的涵蓋期間從 1992 年各國都從蘇聯獨立出來開始，一直到 2009 年為止 (因為可得的各國與俄國的雙邊貿易資料僅止於 2009 年)，總共涵蓋 14 個國家與 18 年的時間，<sup>10</sup> 並且以「國家—

---

10. 在本文所使用的經驗資料中，1992 年的喬治亞、2001 年的塔吉克、1999 年與 2001 年的吉爾吉斯，以及 1992、1993 和 2001 年的烏茲別克，都未在聯合國大會中投票，因此本文的總觀察值總數為 14 國乘以 18 年再減去上述這 7 筆資料，共計有 245 個觀察值。而由於本文以「依變數推遲一年的取值」來作為實際估計的依變數，所以在統計模型中實際運算的觀察值將會比 245 筆資料再少 14 筆 (因為是 14 個國家)。

年度」(state-year) 為本文的分析單位 (unit of analysis)，因此本文的資料在性質上是屬於一個跨層 (國) 跨時 (年) 的追蹤資料 (panel data)，所以在資料中可能存在著時間上的自我相關 (autocorrelation) 與空間上的變異數不齊一性 (heteroscedasticity) 這兩個問題的干擾。為了處理時間上自我相關與空間上變異數不齊一性的問題，本文根據方法論學者的建議，選擇使用包含「追蹤資料時空校正標準誤」的最小平方法迴歸模型 (OLS regression model with panel-corrected standard error) (Beck & Katz, 1995, 2011) 來作為統計估計的方法，並且假設資料中的每一個國家各有不同的一階自我相關 (first-order autocorrelation, AR1) 的誤差結構，且在模型中再加入依變數前一年的取值 (lagged dependent variable) 來進一步控制時間自我相關的問題。<sup>11</sup> 最後，為了進一步證明各國對俄國的態度確實是受到其經濟能力的影響，根據因果關係中「原因」在時間上是發生在「結果」之前的原則，本文採取在計量分析的文獻中常用的方法，以「依變數推遲一年的取值」來作為實際在模型中估計的依變數。

## 二、自變數：國家的經濟能力

本文認為，各個國家本身的可用資源多寡和國內是否能形成一個抗衡的共識是決定他們是否能夠堅持抗衡俄國的外交政策的主要因素，而可用資源多寡和國內是否能形成一個抗衡的共識，則取決

---

11. 事實上，本文作者也採用過其他對追蹤資料有不同假設的「國家固定效果模型」(country fixed-effects model)、「國家隨機效果模型」(country random-effects model) 或是「國家階層線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 來估計本文的自變數對依變數的影響，結果顯示，本文的自變數對依變數的影響力不論是在何種不同假設的模型中都非常地穩定。

於該國的經濟能力。國家經濟能力最為普遍且直覺的測量方式，就是直接以各個國家該年度的「每人國內生產毛額」(GDP per capita)來測量，該年度每人國內生產毛額愈高，即代表該國在該年度的經濟能力愈好。每人國內生產毛額的單位為「千元美金」。<sup>12</sup>

### 三、控制變數

本文的控制變數包含了各種在文獻中被認為可能影響到兩個國家之間的關係的重要變數與各種敵對解釋 (rival explanations)，而其中許多的控制變數也是各國與西方國家之間的關係 (文獻中認為最重要的幾個敵對解釋) 的測量。這些控制變數包括了該國是否與俄國直接接壤 (Bremer, 1992)、<sup>13</sup> 俄國對該國的貿易依賴程度、該國對俄國的貿易依賴程度 (Barbieri, 1996; 2002; Maoz, 2009; Hegre, Oneal & Russett, 2010)、<sup>14</sup> 該國與俄國的政體差異程度、該國的民主程度 (Gartzke, 1998; Bennett & Stam, 2000: 668; Peceny, Beer, & Sanchez-Terry, 2002)、<sup>15</sup> 該國的開放程度 (Oneal & Russett, 2001)、<sup>16</sup> 該國的全球化程度 (Choi, 2010; Schneider, 2014)、<sup>17</sup> 該國的能源

---

12. 每人國內生產毛額的資料來源為 Penn World Table 8.1 (Feenstra, Inklaar & Timmer, 2015)。

13. 若該國有與俄國接壤則編碼為 1，無則編碼為 0。接壤的資料來自 Stinnett, et al. (2002)。

14. 分別以「該國與俄國的貿易量佔俄國整體 GDP 的比例」以及「該國與俄國的貿易量佔該國整體 GDP 的比例」來計算，資料來自於 Barbieri & Keshk (2012)。

15. 以該國在 Polity IV 所獲得的政體分數與俄國在 Polity IV 所獲得的政體分數的絕對值差異來計算。政體分數的資料來自於 Marshall et al. (2016)。

16. 以該國的進出口貿易佔該國 GDP 的百分比來計算，資料來源為 Feenstra et al. (2013)。

17. 以該國在經濟、社會和政治層面上的各個指標的開放程度來計算，資料來源為 Dreher (2006)。

自給率、<sup>18</sup> 該國獲得西方國家援助金額的多寡（百萬美元）、<sup>19</sup> 該國與俄國的相對國力比值（以 GDP 的經濟層面來測量）、<sup>20</sup> 該國當年度是否有與俄國發生軍事衝突、該國與俄國維持和平的時間（年），<sup>21</sup>、該國當年與俄國的主要對手美國之間的關係，<sup>22</sup> 以及該國在該年度是否為歐盟或是北約組織的成員。<sup>23</sup> 此外，本文還在統計模型中加入一個年份變數（year）來進一步控制不同年度的影響，特別是在某些年可能因為歐盟東擴（李玉珍，1997；龍舒甲，

---

18. 以該國的能源進口量佔該國所需能源的百分比來計算，如該國為能源淨出口國則將會有負值，資料來源為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3)。

19. 所有非俄國的西方國家援助金額的資料來自 AidData 2.1 (Tierney et al., 2011)，網址：<http://aiddata.org/>。檢索日期：2015/11/01。

20. 測量方法為該國當年的 GDP 佔俄國當年 GDP 的百分比，若愈接近 1 則表示該國在該年與俄國的相對經濟權力愈接近。GDP 的資料來自 Feenstra et al. (2013)。

這邊要特別說明的是，一般在國際關係的計量研究中常以戰爭數據資料庫 (Correlates of War) 中的「綜合國力指數」(Composite Indicator of National Capability, CINC) (Singer & Bremer, 1972; Singer, 1988) 來作為衡量國家能力的測量。綜合國力指數是以每一個國家的「總人口數」、「都市人口數」、「軍隊人事數量」、「軍費支出」、「主要能源消耗量」以及「鋼鐵產量」等這六大指標佔全球國家在這六項指標總和的百分比來測量每個國家的國力。但因為下列三個理由，本研究不使用綜合國力指數而改以「GDP」來測量各國與俄國的相對國家能力：第一，綜合國力指數的這六項指標在過去注重人力的傳統戰爭中是重要的，但在以科技武器為主的現代戰爭中其決定勝負的影響力大不如前；第二，綜合國力指數的資料僅更新到 2007 年，而本文試圖分析直到 2009 年的最新資料（受限於貿易互賴的資料僅更新到 2009 年）；第三，經過本文作者的資料檢視，即使採用綜合國力指數來測量這 14 國與俄國的相對國力，其結果並未實質改變本文自變數的顯著性與影響力。

21. 如果該國在該年度有與俄國發生軍事衝突則編碼為 1，若否則編碼為 0。軍事衝突的資料來自 Palmer, D'Orazio, Kenwick & Lane (2015)。兩國維持和平的時間是以距離兩國上一次發生軍事衝突有幾年之久來計算。

22. 測量的方式與本文的依變數（該國對俄國抗衡的程度）相同，為該國在該年與美國「投票模式不相同的百分比」與「衝突比率」的乘積。

23. 為兩個不同的虛擬變數：如果該國在該年為歐盟的成員國則編碼為 1，反之則為 0；如果該國在該年有參與北約組織的獨立合作夥伴行動計畫則編碼為 1，反之則為 0。

1998) 或者是反恐合作等等國際大情勢的改變而改變這些國家與俄國之間的合作態度。最後值得一提的是，所有 14 個歐亞國家都與俄國簽有共同防衛協定或是互不侵犯協定 (Gibler, 2008)，所以本文就不再於模型中控制這些國家是否與俄國有聯盟關係。

#### 四、另外兩個在文獻中的重要敵對解釋

除了上述這些控制變數之外，還有兩個重要的敵對解釋也可能影響到這 14 國對俄國外交政策的選擇：其一為該國是否有俄國的油管與天然氣管線經過，因為這直接影響到俄國是否有辦法能夠對各國進行經濟威壓 (economic coercion) 的能力；其二為該國得到俄國援助金額的多寡，因為這直接影響到俄國是否能夠以經濟實力來換取各國的政治支持的可能性。然而，因為下列幾個因素，所以本文在統計模型上並未將這兩個敵對解釋納入考量。

在「能源管線」方面：第一，這 14 個歐亞國家在這段期間全都有俄國的能源管路經過，因此在統計上可視為各國皆有的常數；第二，這些能源管路的總長度與總輸送量的資料基於國家安全上的理由而無法取得，這一方面為資料上的限制，而另一方面相關文獻上也未直接討論這些管線的「總長度」與「總輸送量」會對兩國關係造成影響；第三，雖然能源依賴俄國進口的國家，理論上應該對於俄國較無抗衡的本錢，但因為這些國家也同時掌握著俄國賣往西歐國家的能源管路，扮演著中轉的角色，因此實際上各國與俄國是處於一種可以相互牽制的關係，各國在管道管理上仍然具有與俄國討價還價的實力；最後的第四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在能源上較依賴俄國的國家，反而是那些經濟能力較好、也對俄國持較為抗衡的態度的國家，所以明顯可見「能源依賴」的因素並無法解釋各國抗

衡或扈從的選擇，這一點也與前述各文獻的發現相符。

在「援助金額」方面，雖然在文獻中來自俄國的經濟援助普遍被認為是影響各國對俄政策的關鍵因素，但是這個解釋在邏輯上與經驗證據上存在著幾個問題，因此可以說是揣測多於證據。第一，來自俄國的援助與其說是影響各國對俄態度的原因，倒不如說是各國選擇了對俄政策之後的一種結果，因為會需要俄國援助的國家，當然是那些經濟能力較差的國家，而且也正是那些因為經濟較差因而選擇扈從俄國的國家，才會得到俄國大方的經濟援助來做為親俄的獎勵，因此，在邏輯上，俄國的援助應是各國選擇扈從的結果，而不是影響各國選擇扈從的主要原因。第二，雖然文獻中普遍提及來自俄國的經濟援助的重要性，但至今本文尚未在文獻中找到穩定而可靠的數據來說明俄國到底在哪一年對哪個國家提供了多少額度的經援，這個文獻中普遍接受的觀點，其實缺乏經驗上的證據。第三，如果這個俄國援助影響各國外交政策的假設為真，則我們應該要在本文的統計模型中看到「俄國的相對國力愈強，則各國抗衡俄國的程度應顯著減低」的現象，因為這表示「俄國愈有錢、而各國愈窮，所以更可能因為俄國的援助而轉而支持俄國」，但以下我們將會發現，這個變數在統計模型中並不顯著。

基於上述這些理由，本文的統計模型就不把這兩個敵對解釋納入控制，雖然這兩個說法甚少得到經驗資料的支持，但畢竟是政策分析的文獻上普遍都會被提及的說法，在資料取得的限制之下，可說是本文的一項研究限制，以待未來更多的資料公開之後再做進一步的檢證。

## 五、統計分析

表三 各國抗衡俄國的程度，1992~2009

依變數：各國抗衡俄國的程度 <sub>t+1</sub>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是否加入控制變數	否	否	是	是
是否排除波羅地海三國	否	是	否	是
[依變數 <sub>t</sub> ]				
各國抗衡俄國的程度	0.437*** (0.125)	0.395** (0.138)	0.315** (0.113)	0.236 (0.130)
[自變數 <sub>t</sub> ]				
該國每人國內生產毛額(千元美金)	0.002*** (0.001)	0.003*** (0.001)	0.002* (0.001)	0.005*** (0.001)
[控制變數 <sub>t</sub> ]				
該國是否與俄國接壤			0.005 (0.007)	0.018** (0.007)
俄國對該國的貿易依賴程度			-2.157 (1.378)	-5.956 (3.185)
該國對俄國的貿易依賴程度			0.115 (0.092)	0.375* (0.158)
該國與俄國的政體差距程度			0.000 (0.001)	0.001 (0.001)
該國的政體分數			0.001 (0.001)	0.001 (0.001)

該國的全球化指數	-0.000 (0.000)	-0.001** (0.000)
該國的貿易佔GDP的百分比	0.003 (0.012)	-0.004 (0.013)
該國的淨能源依賴程度	0.000 (0.000)	0.000 (0.000)
該國當年是否有與俄國發生軍事衝突	0.013* (0.005)	0.017** (0.006)
來自西方國家的援助金額(百萬美元)	-0.000 (0.000)	-0.000 (0.000)
該國與俄國的相對國力比值(以GDP 來衡量)	0.059 (0.099)	-0.145 (0.181)
該國與俄國維持和平的時間(年)	-0.001 (0.001)	-0.002 (0.001)
年度	0.002 (0.001)	0.002 (0.001)
該國是否為歐盟的成員國	0.003 (0.014)	-0.003 (0.015)
該國是否加入北約組織的合作夥伴計 劃	0.013 (0.009)	0.016 (0.011)
該國與美國的關係	-0.056 (0.040)	-0.057 (0.044)

該國與德國的關係			-0.001 (0.011)	0.007 (0.012)
常數	0.019** (0.006)	0.017** (0.006)	-3.007 (1.657)	-3.069 (1.766)
R-squared	0.2962	0.3135	0.4328	0.4894
Wald Chi-squared	74.125	85.880	105.370	168.266
Probability>Chi-squared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國家數	14	11	14	11
樣本數	227	176	221	170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說明：括號內數字為標準誤。\*  $p < 0.05$ , \*\*  $p < 0.01$ , \*\*\*  $p < 0.001$ 。

表三為本文的主要模型。模型一為最陽春的設定，主要在於證明在排除其他控制變數之前，本文的自變數「國家的經濟能力」對於這 14 個歐亞國家的對俄政策即有顯著的影響，使用的是採用追蹤資料時空校正標準誤的 OLS 迴歸模型。模型一的結果可詮釋為，在控制其他的變數之前，國家的經濟能力每增加一個單位（每人國內生產毛額每增加一千元美金），則其抗衡俄國的程度將增加 0.002 個單位。

模型二所有的設定與模型一完全相同，只是在樣本中排除了波羅地海三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由於波羅地海三國從獨立以來一向都為這 14 個歐亞國家中最富有、也最抗衡俄國的國家，並且也都在 2004 年加入了歐盟 (European Union) 與北約組織 (NATO) 的合作夥伴計劃，這一點更使這三國與其他 11 個歐亞國家有所不同，因此，為了表示本文的自變數的影響力並不是因為受到這三個國家的干擾所造成的虛假結果，本文也在模型二中顯示排除

這三個國家的觀察值之後所估計得到的統計模型。<sup>24</sup> 模型二的結果顯示，即使在排除了波羅地海三國之後，本文的自變數對於俄國外交政策的選擇還是具有非常穩健的影響力，不僅在這 11 國之中，經濟能力好的國家比經濟能力差的國家更可能堅持抗衡俄國的立場，而且在同樣的國家中，其經濟能力好的時候也比其經濟能力差的時候更可能堅持抗衡俄國的立場。模型二的結果的詮釋為，在排除了這三個波羅地海國家之後，國家的經濟能力每增加一個單位（每人國內生產毛額每增加一千元美金），則其抗衡俄國的程度將增加 0.003 個單位。

模型三除了自變數之外，還納入了其他所有的控制變數，以表示在排除了其他可能的解釋以後，本文的自變數依然還是有顯著的影響。<sup>25</sup> 模型三同樣使用採用追蹤資料時空校正標準誤的 OLS 迴歸模型。模型三的結果的詮釋為，在控制其他的變數之後，國家的經濟能力每增加一個單位，則其抗衡俄國的程度將增加 0.002 個單位。

模型四所有的設定與模型三完全相同，只是在樣本中排除了波羅地海三國，以證明即使在排除對本文的說法最有利的觀察值以

---

24. 事實上，除了排除經濟能力最發達的波羅地海三國來作統計測試之外，本文作者也測試過排除經濟能力最落後的中亞五國來作統計測試，或是同時排除波羅地海三國和中亞五國（僅保留經濟能力介於其間的西部三國和高加索山三國）來作統計測試，在這些不同的樣本子集（sub-sample）中的統計模型所估計的結果，本文的自變數都能夠達到顯著並且具有重要的實質影響力。這個測試說明經濟能力確實在各個國家中都是影響抗衡或扈從選擇的一個相當重要的因素。在這麼多的統計測試中，本文選擇僅列出排除經濟能力最發達的波羅地海三國的結果，因為來自於這最富裕的三國的觀察值是最有可能使本文的統計模型產生偏誤的樣本。

25. 雖然本文的模型有許多的控制變數，但本文在使用 OLS 模型估計之後，再進行變異膨脹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檢定（Fox & Monette, 1992）的結果，其 VIF 的平均值為 3.93，遠低於 10 的危險門檻，因此可知這些變數之間的多重共線性（multicollinearity）的問題並不至於影響到統計模型的估計。

後，本文自變數的影響力依然不變。模型四的結果的詮釋為，在排除了這三個波羅地海國家與控制其他的變數之後，國家的經濟能力每增加一個單位（每人國內生產毛額每增加一千元美金），則其抗衡俄國的程度將增加 0.005 個單位。

從統計模型的分析結果可見，來自 14 個歐亞國家近 20 年（1992~2009）的經驗證據支持了本文根據文獻所提出來的假設：國家的經濟能力確實影響到了其對俄國抗衡或是扈從的選擇。

## 伍、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的論點為，根據文獻的建議，經濟能力影響了這 14 個國家在抗拒俄國的影響力時的「能力」與「意願」，因此決定了各國抗衡或扈從俄國的外交政策選擇，而各國從先後獨立開始一直到 2009 年的經驗資料也證實了本文的說法。在最後結論的部分，我將討論本文的發現與過去文獻的發現有何異同、當前歐亞國家對俄關係的新進展，以及本文的論點對於我們所關心的兩岸關係的研究在理論上與實務上可能帶來的啟示與貢獻。

### 一、與過去文獻的討論

本文的發現與吳玉山（1997a；1997b）的發現有相似之處，但仍有幾處重要的不同。在相似之處的部分，吳玉山（1997a；1997b）發現，在這 14 個歐亞國家中，發展程度愈高、得到西方支持愈多的國家，愈容易採取抗衡俄國的策略，而本文的理論與經驗證據也有與之相同的發現。然而，本文的發現與吳玉山（1997a；1997b）的發現不同之處有二：第一，本文發現，不僅在這 14 個國家中經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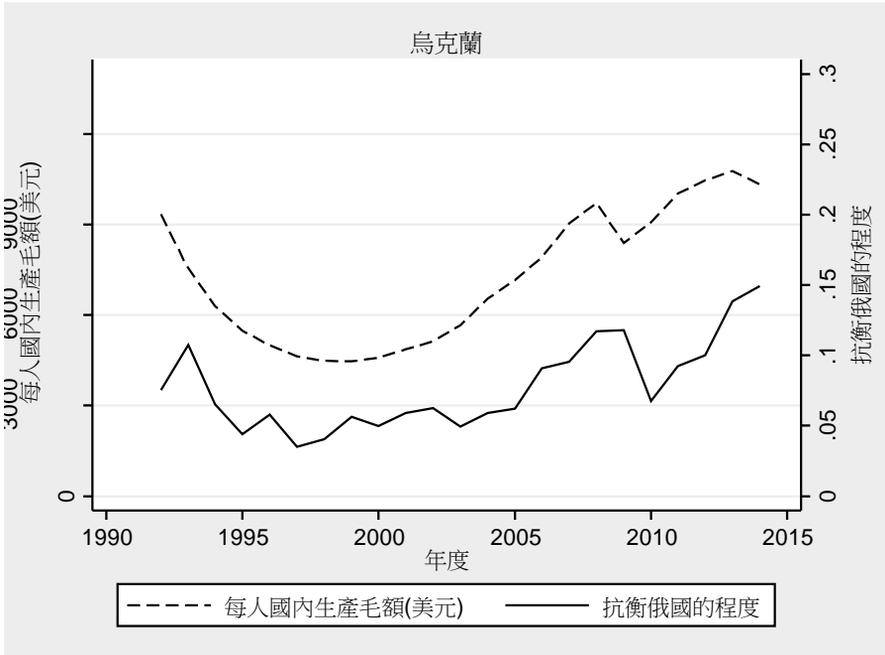
力愈高的國家愈可能採取抗衡俄國的策略，甚至在同一個國家中，經濟能力愈好的那些年愈有可能對俄國採取抗衡的策略。這個發現在以單一國家為觀察對象的分析單位中進一步支持了吳玉山 (1997a；1997b) 的說法。第二，吳玉山 (1997a；1997b) 認為，經濟能力好的國家之所以能夠成功維持其抗衡政策的原因，是因為這些較為接近西方、也較為富裕的國家，愈能夠得到西方世界的支持，因此西方世界的支持才是解釋各國抗衡政策背後的主要原因。得到西方的支持與否這個因素，在各國脫離蘇聯獨立之初也許是重要的原因，然而，本文發現，隨著時間過去，這個因素不論是由「各國與美國的關係」、「各國與德國的關係」，或是「各國獲得西方國家的援助的多寡」來測量，都未能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性，這個結果表示，隨著時間的過去，來自西方國家的支持或援助，對於各國是否能夠堅持抗衡俄國的選擇可能是愈來愈不重要的考量。總結來說，是各國的「經濟能力」——而不是各國「是否能夠得到西方世界的支持」——才是持續影響到各國選擇抗衡或是扈從的關鍵因素。

## 二、當前歐亞國家對俄關係的新進展

受限於部分控制變數的可得性，本文的經驗證據分析僅包含 1992~2009 年的資料。從 2009 年之後，這 14 個歐亞國家的對俄關係主要有兩個重要的新發展。第一，在 2013 年，為了反對烏克蘭加入歐盟、遠離俄國，烏克蘭東部的親俄勢力發動了政變，並在 2014 年 3 月 11 日引發原屬於烏克蘭的克里米亞半島宣布獨立建國，並隨即在 3 月 16 日舉辦的公投中，以 97% 的民眾支持率宣布加入俄國，並迅速在 4 月 11 日獲得俄國的修憲接納，成為俄國領土的一部分。第二，在 2014~2015 年，在俄國的主導下，與白俄羅斯、哈薩克、

亞美尼亞和吉爾吉斯組成了「歐亞經濟聯盟」(Eurasian Economic Union, EAEU)，建立更密切的經貿與政治關係，此舉一般被認為是俄國想要在該地區建立一個與歐盟對抗的機制。本文的理論，是否也能夠對於這兩個歐亞地區的新發展提供解釋呢？

首先來看烏克蘭的情形。下圖二為歷年來烏克蘭的經濟能力與抗衡俄國程度的變化。烏克蘭從 2002 年加入了北約組織的獨立合作夥伴行動計畫後，開始隨著經濟能力的提升而愈加親近歐洲、遠離俄國，大有成為歐盟新成員的氣勢。然而，這個愈加親近歐洲、遠離俄國的政策，也引發烏克蘭國內親俄勢力的不滿，終於成為了在 2013 年底所正式爆發的「反對親歐盟示威運動」的主因，而後造成了親俄派所掌控的地區作出了脫離烏克蘭加入俄國的決定。在圖二中可以清楚地發現，烏克蘭抗衡的程度明顯隨著其經濟能力而改變，而且是經濟能力的變化發生在抗衡程度的變化之前，相當程度地顯示了經濟因素對於烏克蘭對俄政策選擇的影響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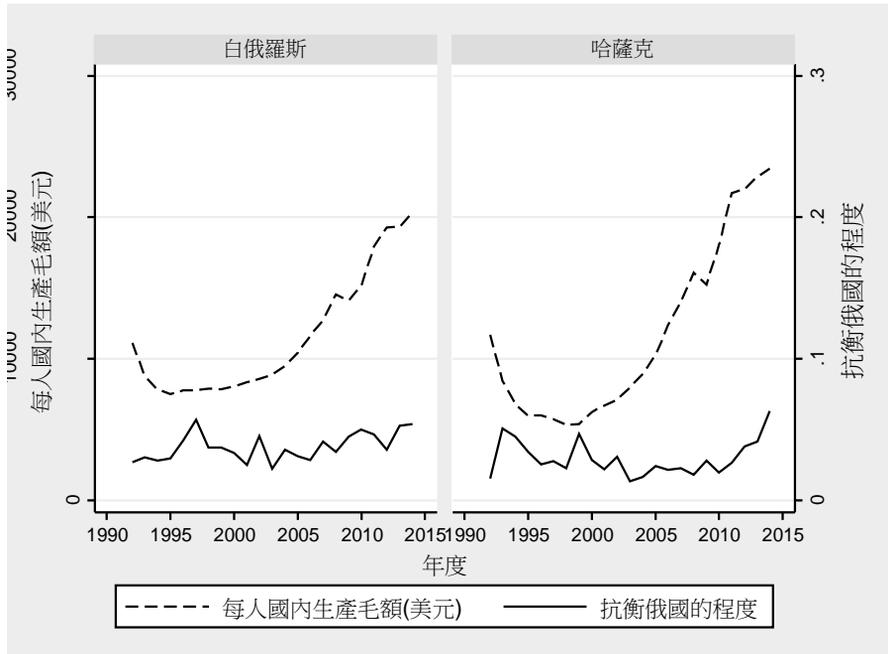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作者以 STATA 統計軟體自繪。

圖二 烏克蘭的經濟能力與抗衡俄國程度的變化，1992~2014

接著分析關於白俄羅斯、哈薩克、亞美尼亞和吉爾吉斯與俄國組成「歐亞經濟聯盟」的新發展。其中，吉爾吉斯和亞美尼亞兩國，向來就是歐亞 14 國中經濟能力較低、也較為扈從俄國的國家，而其經濟能力自從獨立後至今 20 餘年以來並未明顯改善（參見表二之數據），因此吉爾吉斯和亞美尼亞兩國加入俄國「歐亞經濟聯盟」的決定，亦為本文的理論所預期的結果。然而，白俄羅斯和哈薩克的情形就比較值得探究。下圖三為白俄羅斯和哈薩克兩國歷年來的經濟能力與抗衡俄國程度的變化。在經濟能力上，白俄羅斯和哈薩克事實上是在歐亞 14 國中僅次於波羅地海三國的富裕國家，但這兩國抗衡俄國的程度向來在歐亞 14 國中都是偏低的，其原因可能在於這兩國在出口經濟上都是 14 國中最为依賴俄國的國家，因為俄國是白

俄羅斯的主要產業農業和機械產品的最大購買國，也是哈薩克的主要產業能原礦產的最大購買國，從這個事實看來，兩國加入俄國「歐亞經濟聯盟」亦為一個經濟趨動的理性選擇。圖三的趨勢也說明了，雖然白俄羅斯和哈薩克抗衡俄國的程度向來在歐亞 14 國中都是偏低的，但兩國抗衡俄國的態勢在近年來確實隨著兩國經濟能力的轉好而漸有提高。在對俄國的貿易依賴和本身的經濟能力這兩個推力和拉力都日益增加的情況之下，兩國未來的對俄政策將會如何轉變，亦為充滿理論潛力的未來研究議題。



資料來源：作者以 STATA 統計軟體自繪。

圖三 白俄羅斯和哈薩克兩國的經濟能力與抗衡俄國程度的變化，1992~2014

### 三、對兩岸關係的啟示

本文的理論與經驗證據都建議，當一個小國在對抗一個權力不對等的大國的時候，小國本身是否有足夠的經濟能力是其能否堅持抗衡選擇的關鍵，而小國是否能夠得到來自於其他國家的支持則並非必要的因素，這個發現若與台灣對抗中國的經驗比較起來，是一個非常具有啟示意義的對照。雖然這 14 個歐亞國家的經濟能力與邁入已開發國家的台灣有一段落差，但回顧自 1987 年解嚴以來台灣對中共外交政策取向的演變歷史，台灣本身的經濟能力表現對於兩岸關係的演變確實具有明顯的影響，這個過程意外地與本文的發現相符，也使得本文的發現顯示出對兩岸關係的政策意涵。

台灣在 1987 年解嚴以後，一直到 2000 年美國的達康 (.com) 泡沫發生之前，台灣的經濟一直都能夠保持高度的成長，而在這段時間中，面對中國的威脅，台灣也都能夠堅持住抗衡的立場。例如 1995~1996 年的兩次台海飛彈危機，都並未使台灣屈服於中國的要求而選出中共屬意的領導人；此外，面對世界各國搶進中國市場的競爭風潮，當時的總統李登輝所主打的「戒急用忍」的大陸政策也能夠有效地在國內獲得一定的支持基礎，於是在整個李登輝的主政其間，台灣在兩岸政策上一直都能夠有效地堅持抗衡中國的立場。然而，在 2000 年達康泡沫破裂以後，在 2001 年台灣出現自從 1970 年代的石油危機以來首次的經濟負成長，當時的總統陳水扁除了難以推行其理想中對中國的抗衡政策之外，甚至還被迫在國內的各種壓力之下，在法理上承認各種已經對中國的開放事實，這段期間台灣對中國政策的演變，已經顯現出在經濟難以持續發展時國內的政治菁英難以堅持抗衡選擇的態勢。2008 年馬英九總統上台之後，隨即面對到美國次貸金融風暴所造成的全球不景氣，再加上台灣對中

國的貿易依賴日益增加，使得台灣的大陸政策轉為更加積極，而國內的多數民意也支持對中國的開放立場，促成馬英九在 2012 年能夠持續以主打更積極整合的兩岸政策作為競選主軸而獲得多數民意的支持。由此可見，台灣自從解嚴之後的大陸政策，深深受到台灣本身經濟能力的影響。當台灣有足夠的經濟能力時，就較容易對中國堅持抗衡的兩岸政策，反之，當台灣的經濟能力出現問題時，國內就會開始出現是否該繼續堅持對中國的抗衡的歧見，而使得台灣採取更加寬鬆的兩岸政策。若以本文的發現來預測甫於 2016 年新上任的蔡英文總統與民進黨政府的兩岸政策，本文將預期，若台灣的經濟能力無法在短期內好轉，則新政府拒絕明確承認「九二共識」的兩岸政策將在國內面臨諸多的挑戰。以本文的理論看來，台灣的經濟能力對於兩岸關係的演變具有重要的影響力，台灣的未來將會走向更為對抗中國或是更為扈從中國，端視台灣是否能夠有辦法維持持續成長的經濟表現，而台灣日益依賴中國市場的事實，也暗示著台灣愈來愈難以獨力達成經濟成長，在這個趨勢沒有轉變的情況之下，未來台灣對中國選擇「扈從」的可能性將會愈來愈高（回顧前述白俄羅斯和哈薩克的例子），這個發展趨勢值得我們警惕，也暗示著執政者應儘快提出相關的政策以之因應。

## 參考書目

- Bailey, Michael A., Anton Strezhnev and Erik Voeten. 2017. "Estimating Dynamic State Preferences from United Nations Voting Data,"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Forthcoming.
- Barbieri, Katherine. 1996.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 Path to Peace or a Source of Interstate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33, 1 (February): 29–49.
- Barbieri, Katherine. 2002. *The Liberal Illusion: Does Trade Promote Peace?*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Barbieri, Katherine, and Omar M. G. Keshk. 2012. 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 Trade Data Set Codebook, Version 3.0. Online: <http://correlatesofwar.org>. Latest update 18 November 2015.
- Beck, Nathaniel, and Jonathan N. Katz. 2011. "Modeling Dynamics in Time-Series–Cross-Section Political Economy Data."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14, 1 (2011): 331–52.
- Beck, Nathaniel. 1995. "What to Do (and Not to Do) with Time-Series Cross-Section Data."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9, 3 (September): 634–47.
- Beckley, Michael. 2011. "China's Century? Why America's Edge Will End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6, 3 (Winter): 41–78.
- Bennett, D. Scott and Matthew C. Rupert. 2003. "Comparing Measures of Political Similarity An Empirical Comparison of S Versus Tb 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 47, 3 (June): 367–93.
- Bennett, D. Scott and Allan C. Stam. 2000. “Research Design and Estimator Choices in the Analysis of Interstate Dyads: When Decisions Matter.”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44, 5 (October): 653–85.
- Bremer, Stuart A. 1992. “Dangerous Dyads: Conditions Affecting the Likelihood of Interstate War, 1816-1965.”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36, 2 (June): 309–41.
- Bueno de Mesquita, Bruce and Alastair Smith. 2012. “Domestic Explanation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15, 1 (2012): 161–81.
- Bueno de Mesquita, Bruce, Alastair Smith, Randolph M. Siverson, and James D. Morrow. 2003. *The Logic of Political Survival*.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Buzan, Barry, and Professor Ole Wæver. 2004. *Regions and Powers: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2015. “The World Factbook.” in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resources/the-world-fact-book/>. Latest update 18 November 2015.
- Chen, Ian Tsung-Yen, and Alan Hao Yang. 2013. “A Harmonized Southeast Asia? Explanatory Typologies of ASEAN Countries’ Strategies to the Rise of China.” *The Pacific Review* 26, 3 (July): 265–88.
- Choi, Seung-Whan. 2010. “Beyond Kantian Liberalism Peace through

- Globalization?”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27, 3 (July): 272–95.
- Christensen, Thomas J. 1997. “Perceptions and Alliances in Europe, 1865-1940.”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1, 1 (January): 65–97.
- Christensen, Thomas J. 1996. *Useful Adversaries: Grand Strategy, Domestic Mobilization, and Sino-American Conflict, 1947-1958*.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hristensen, Thomas J., and Jack Snyder. 1990. “Chain Gangs and Passed Bucks: Predicting Alliance Patterns in Multipolar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4, 2 (April): 137–68.
- Chung, Jae Ho. 2009. “East Asia Responds to the Rise of China: Patterns and Variations.” *Pacific Affairs* 82, 4 (Winter): 657–75.
- Clark, David H., Timothy Nordstrom, and William Reed. 2008. “Substitution Is in the Variance: Resources and Foreign Policy Choic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2, 4 (October): 763–73.
- Dawisha, Karen and Bruce Parrott. 1994. *Russia and the New States of Eurasia: The Politics of Upheaval*.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reher, Axel. 2006. “Does Globalization Affect Growth? Evidence from a New Index of Globalization.” *Applied Economics* 38, 10 (June): 1091–1110.
- Drezner, Daniel W. 1999. *The Sanctions Paradox: Economic Statecraft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eenstra, Robert C., Robert Inklaar and Marcel P. Timmer. 2015. "The Next Generation of the Penn World Tabl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5, 10 (October): 3150–82.
- Fox, John and Georges Monette. 1992. "Generalized Collinearity Diagnostic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87, 417 (March): 178–83.
- Gartzke, Erik. 1998. "Kant We All Just Get Along? Opportunity, Willingnes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Democratic Peac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2, 1 (January): 1–27.
- Gartzke, Erik. 2000. "Preferences and the Democratic Peac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44, 2 (June): 191–212.
- Gibler, Douglas M. 2008. *International Military Alliances, 1648-2008*. Washington, D.C: CQ Press.
- Glaser, Charles L. 1994. "Realists as Optimists: Cooperation as Self-Help."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 3 (December): 50–90.
- Goldstein, Joshua S. 1992. "A Conflict-Cooperation Scale for WEIS Events Data."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36, 2 (June): 369–85.
- Hegre, Håvard, John R Oneal, and Bruce Russett. 2010. "Trade Does Promote Peace: New Simultaneous Estimates of the Reciprocal Effects of Trade and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47, 6 (November): 763–74.
- Jervis, Robert. 1976.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Jervis, Robert. 1978.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30, 2 (January): 167–214.

Jones, Daniel M., Stuart A. Bremer, and J. David Singer. 1996.

“Militarized Interstate Disputes, 1816–1992: Rationale, Coding Rules, and Empirical Patterns.”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15, 2 (September): 163–213.

Kang, David C. 2003. “Getting Asia Wrong: The Need for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7, 4 (April): 57–85.

Kang, David C. 2007. *China Rising: Peace, 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Kang, David C. 2010. *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 Five Centuries of Trade and Tribute*.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Katzenstein, Peter J. 2005. *A World of Regions: Asia and Europe in the American Imperiu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Kaufman, Stuart, Richard Little,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2007. eds. *Balance of Power in World History*.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Keohane, Robert O. 1984.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abs, Eric J. 1992. “Do Weak States Bandwagon?” *Security Studies* 1, 3 (March): 383–416.

Lake, David A. 2009.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Lake, David A. and Patrick M. Morgan. 1997. eds. *Regional Orders:*

- Building Security in a New World*.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Lemke, Douglas. *Regions of War and Peace*. 2002.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evy, Jack S. 2002. "Balances and Balancing: Concepts, Propositions, and Research Design." in *Realism and the Balancing of Power: A New Debate*.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 Lectaru, Kaley and Philip A. Schrodt. 2013. "GDELT: Global Database of Events, Language, and Tone." *The 2013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Annual Convention*. 3-6 April 2013. San Francisco, CA, USA.
- Liska, Professor George. 1962. *Nations in Alliance: The Limits of Interdependence*. Baltimore, M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Lynn-Jones, Sean M. 1995. "Offense-Defense Theory and Its Critics." *Security Studies* 4, 4 (June): 660-91.
- Maoz, Zeev. 2009. "The Effects of Strategic an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on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cross Levels of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3, 1 (January): 223-40.
- Marshall, Monty G., Ted R. Gurr, and Keith Jagers. 2016. "Polity IV Project: Political Regime Characteristics and Transitions, 1800-2015." in <http://www.systemicpeace.org/polityproject.html>. Latest update 19 May 2016.
- McDonald, Patrick J. 2007. "The Purse Strings of Peace." *American*

-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1, 3 (July): 569–82.
- Mearsheimer, John J. 1994.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 3 (December): 5–49.
- Mearsheimer, John J. 2001.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NY: W. W. Norton & Company.
- Mesquita, Bruce Bueno de. 1975. “Measuring Systemic Polarity.”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9, 2 (June): 187–216.
- Morgan, T. Clifton and Glenn Palmer. 2000. “A Model of Foreign Policy Substitutability: Selecting the Right Tools for the Job(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44, 1 (February): 11–32.
- Narizny, Kevin. 200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and Strateg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Oneal, John R. and Bruce Russett. 2001. *Triangulating Peace: Democracy,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New York, NY: W. W. Norton & Company.
- Palmer, Glenn, Vito D’Orazio, Michael Kenwick, and Matthew Lane. 2015. “The MID4 Dataset, 2002–2010: Procedures, Coding Rules and Description.”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32, 2 (April): 222–42.
- Palmer, Glenn and T. Clifton Morgan. 2006. *A Theory of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Peceny, Mark, Caroline C. Beer, and Shannon Sanchez-Terry. 2002. “Dictatorial Peac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6, 1 (March): 15–26.
- Rose, Gideon. 1998.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 Policy.” *World Politics* 51, 1 (October): 144–72.
- Ross, Robert S. 2006. “Balance of Power 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China: Accommodation and Balancing in East Asia.” *Security Studies* 15, 3 (July-September): 355–95.
- Rothstein, Robert L. 1968. *Alliances and Small Powers*.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Schneider, Gerald. 2014. “Peace through Globalization and Capitalism? Prospects of Two Liberal Proposition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51, 2 (March): 173–83.
- Schroeder, Paul. 1994. “Historical Reality vs. Neo-Realist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 1 (Summer): 108–48.
- Schweller, Randall L. 1994.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 1 (July): 72–107.
- Schweller, Randall L. 2004. “Unanswered Threats: A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Under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9, 2 (October): 159–201.
- Schweller, Randall L. 2006. *Unanswered Threats: Political Constraints on the Balance of Pow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ignorino, Curtis S. and Jeffrey M. Ritter. 1999. “Tau-B or Not Tau-B: Measuring the Similarity of Foreign Policy Posi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43, 1 (March): 115–44.
- Singer, David J. and Stuart Bremer. 1972. “Capability Distribution, Uncertainty, and Major Power War, 1820-1965.” in Bruce M.

- Russett, ed. *Peace, War, and Numbers*, 19–48. Beverly Hills, CA: Sage.
- Singer, J. David. 1988. “Reconstructing the Correlates of War Dataset on Material Capabilities of States, 1816–1985.”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14, 2 (May): 115–32.
- Snyder, Jack L. 1991.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Starr, Harvey. 1994. “Revolution and War: Rethinking the Linkage between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nflict.”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47, 2 (June): 481–507.
- Stinnett, Douglas M., Jaroslav Tir, Paul F. Diehl, Philip Schafer, and Charles Gochman. 2002. “The Correlates of War (Cow) Project Direct Contiguity Data, Version 3.0.”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19, 2 (September): 59–67.
- Sweeney, Kevin, and Omar M. G. Keshk. 2005. “The Similarity of States: Using S to Compute Dyadic Interest Similarity.”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22, 2 (April): 165–87. doi: 10.1080/07388940590948583.
- Taliaferro, Jeffrey W. 2001. “Security Seeking under Anarchy: Defensive Realism Revisite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 3 (January): 128–61.
- Thompson, William R. 1973. “The Regional Subsystem: A Conceptual Explication and a Propositional Inventor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17, 1 (March): 89–117.
- Tierney, Michael J. et al. 2011. “More Dollars than Sense: Refining

- Our Knowledge of Development Finance Using AidData.” *World Development* 39, 11 (November): 1891–1906.
- Van Evera, Stephen. 1984. “The Cult of the Offensiv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9, 1 (July): 58–107.
- Van Evera, Stephen. 1985. “Why Cooperation Failed in 1914.” *World Politics* 38, 1 (October): 80–117.
- Walt, Stephen M. 1987.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Waltz, Kenneth N.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 Weeks, Jessica L. 2008. “Autocratic Audience Costs: Regime Type and Signaling Resolv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2, 1 (January): 35–64.
- Weeks, Jessica L. 2012. “Strongmen and Straw Men: Authoritarian Regimes and the Initi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6, 2 (May): 326–347.
- Wohlforth, William C. 1987. “The Perception of Power: Russia in the Pre-1914 Balance.” *World Politics* 39, 3 (April): 353–81.
- World Bank. 2013.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3.” in <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Latest update 1 November 2015.
- Zakaria, Fareed. 1998. *From Wealth to Pow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李玉珍。1996。〈俄羅斯對『獨立國協』政策的演變〉。《問題與

- 研究》35, 8: 26-36。(Li, Y.C. 1996. "The Evolution of Russia's Polity toward 'The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Issues & Studies* 35, 8: 26-36.)
- 李玉珍。1997。〈北約東擴與俄國的反應〉。《問題與研究》36, 3: 100-101。(Li, Y.C. 1997. "NATO's Eastward Expansion and Russia's Response." *Issues & Studies* 36, 3: 100-101.)
- 吳玉山。1997a。〈抗衡或扈從：面對強鄰時的策略選擇(上)〉。《問題與研究》36, 2: 1-32。(Wu, Y. S. 1997a. "Balancing or Bandwagoning: The Foreign Policy Choice toward a Strong Neighboring Country, Part I." *Issues & Studies* 36, 2: 1-32.)
- 吳玉山。1997b。〈抗衡或扈從：面對強鄰時的策略選擇(下)〉。《問題與研究》36, 3: 61-80。(Wu, Y. S. 1997b. "Balancing or Bandwagoning: The Foreign Policy Choice toward a Strong Neighboring Country, Part II." *Issues & Studies* 36, 3: 61-80.)
- 吳玉山。2009。〈權力不對稱與兩岸關係研究〉，包宗和、吳玉山編《重新檢視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31-59。台北：五南。(Wu, Y. S. 2009. "Power Asymmetry and the Study of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hip." in T. H. Pao and Y. S. Wu. eds. *Reinvestigating the Debating Cross-Strait Relations Theories*. Taipei: Wunan Press.)
- 楊三億。2009。〈前蘇聯地區內部改革與對外政策偏好關係：以烏克蘭、白俄羅斯與摩爾多瓦為例〉。《問題與研究》48, 3: 97-121。(Yang, S. Y. 2009.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Internal Reform and External Policy in the Post-Communist Region: Belarus, Moldova and Ukraine." *Issues & Studies* 48, 3: 97-121.)

- 楊三億。2014。〈歐盟對烏克蘭政策之外溢效果〉。《問題與研究》，53，1：1-34。(Yang, S. Y. 2014. “Spillover Effects and EU’s Policy to Ukraine.” *Issues & Studies* 53, 1: 1-34.)
- 鄭敦仁、徐斯勤。2007。〈在權力制衡與扈從之間—對冷戰後東亞國際關係的重估〉。朱雲漢、賈慶國編《從國際關係理論看中國崛起》：59-93。台北：五南。(Cheng, T.J. and S.C. Hsu. 2007. “Between Balancing and Bangwagoning: Reapprais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East Asia after the End of Cold War.” in Y. H. Chu and C. K. Chia. eds. *Analyzing China’s Rising b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Taipei: Wunan Press.)
- 龍舒甲。1998。〈北約擴大與俄羅斯的反應〉。《問題與研究》，37，1：25-40。(Lung, S.C. 1998. “The Expansion of NATO and Russia’s Reaction.” *Issues & Studies* 37, 1: 25-40.)
- 龍舒甲。2001。〈外高加索地區新情勢：兼論俄羅斯對該地區政策之轉變〉。《問題與研究》40，3：49-67。(Lung, S.C. 2001. “The New Development of the Transcaucasia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lso on the Change of Russia’s Transcaucasia Policy.” *Issues & Studies* 40, 3: 49-67.)

## **To Balance or to Bandwagon? Revisiting the Fourteen Newly Independent States' (NISs) Foreign Policy Choices toward Russia, 1992~2009**

Chienwu (Alex) Hsueh \*

Since the collapse of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USSR) in 1991,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Russia and the fourteen former USSR Eurasian states has been an ideal experiment field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Previous research has demonstrated that, among the fourteen newly independent states (NISs), those who are politically closer to the Western world and more developed tend to balance against Russia; and, those who are less close to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ose who are less developed tend to bandwagon with it. However, it has been twenty years since the NISs became independent from Russia. Whether the NISs have changed their foreign policy attitudes toward Russia and whether the two factors of proximity to the West and development are still influential in affecting their Russia policy is in need of further investigation. In order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this article develops a new measurement of “balancing or bandwagoning,” which simultaneously concerns “the degree of interest

---

\*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issimilarity” and “the degree of conflict” between Russia and the fourteen NISs. By applying this new measurement, I find that the NISs’ relationship with the Western world has become less important in the making of their Russia policy, while their ability to maintain their economic development remains the most prominent factor that determines their balance/bandwagon foreign policy choice toward Russia. This is because, as prior research has suggested, their ability to maintain their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two important effects that determine their foreign policy choices. First, it means that the NISs have enough state capacity to solve their domestic problems and that they may have a sufficient surplus of resources to support their decision to balance – that is, they have more “capability” to balancing. Second, because they were able to develop by themselves, their domestic political elites are more likely to reach a consensus on their decision to balance – that is, they have more “willingness” to keep balancing. Otherwise, the elites are more inclined to divide into hawks and doves, which could lead to a debate in the domestic political arena over whether their country should continue to balance against Russia. Empirical evidence of all the fourteen NISs from 1992 to 2009 supports the argument that states increase their balancing behavior against Russia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ir economic capacity. The finding of this research has important policy implications with regards to the evolution of Taiwan’s China policy as well as the future of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hip.

**Keywords:** Balance, Bandwagon, Russia, Economic Capacity, Cross-Strait Relationship